

斗鸡台考古发掘对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的多维意义

吴功翔 夏保国

“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宿白主编：《苏秉琦先生纪念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是陕西省境内第一次注入现代考古科学理念的田野考古工作，在此之前，安特生发现的仰韶遗址，以及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发掘，使国内外学者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原地区。极少有学者关注到三秦大地下的周秦汉唐考古遗存。徐旭生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断定关中地区的丰富遗存将必定成为中国考古学田野工作的重要区域。徐旭生本人也毅然舍弃北京的优渥条件来到陕西，排除万难筹组陕西第一个现代考古科研机构——陕西考古会，将科学的现代考古学理念通过北平研究院这个国家级科研机构 and 陕西考古会等地方性研究机构带入到地方，让考古科学的种子在关中这片文化沃土中生根发芽。彼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河南、山东等地开展田野考古发掘时，都受到了当地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阻力，徐旭生等考古学人克服了各方面困难，通过与陕西地方知识分子群体合作，排除阻力的同时，还将现代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和开展考古工作的必要性向地方公众传播，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大众也能初步了解考古学的目的与意义。斗鸡台遗址的成功发掘，为陕西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植入了科学基因，揭开了陕西现代考古事业的序幕，是陕西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早期重要田野实践

尽管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限于条件，导致在具体实操上仍然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下甚至还能称之为“不太科学的考古发掘”，但毋庸置疑，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中国考古学肇始于1921年安特生发掘的仰韶遗址，而后在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推动下，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商周时期的考古工作均取得了巨大进步。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重要遗址的发掘中，不乏有李济、梁思永等具有考古学专业知识的留学归国人才，也有外国学者直接参与或西方考古学思想的间接指导，这必然对促进中国考古学科学发展影响巨大，使之成为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的“中心”。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也应该重视同时期一些非考古学专业出身却矢志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考古学家所做出的努力，徐旭生领导的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正是如此。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成员中没有人真正具备科学的考古学专业知识和学科素养，但仍能在这里诞生出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从这个意义来说，斗鸡台遗址考古发掘无疑在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阶段中是一次伟大的考古实践。

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延伸

徐旭生根据在陕西考察所获的材料，

结合历史文献，认为传说时代的炎帝集团其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的渭水上游地带，继而提出中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说”，拓宽了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的新途径，为研究中国古史提出了崭新且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这些学术思想对后世启发甚巨，徐旭生的学生，也是深度参与斗鸡台发掘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苏秉琦受此影响，在整理斗鸡台西周墓地考古资料后写出的《瓦鬲之研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等系列学术文章，被考古学界公认为中国考古学类型的奠基之作。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苏秉琦开始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这一重大学术课题，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应当比简单的“中心辐射”模式更复杂。苏秉琦沿着徐旭生的思路，系统提出著名的“史前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将中国境内的史前遗址的遗物进行了系统整理、分类和概括，以各区域的典型遗物为“块块”，用各种考古学文化为“条条”，在空间与时间的坐标上，勾勒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结构关系，将全国划分为六大考古学文化区域。其中以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上古三集团”中华华夏族的活动区域大致相合，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和东夷部落的活动范围基本一致，以洞庭湖地区和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和苗蛮集团的活动区域大致对应。这样，上述区域的史前考古资料在徐旭生的“三集团说”理论下被赋予了社会历史意义，即考古所获的器物不再只是物质文化的载体，它可以与华夏、东夷和苗蛮等族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宗教等重大文化现象相联系，在具体研究中重视史前部落集团的生产生活情况，达到“透物见人”的学科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得以逐步建立，“史前区系类型理论”也迅速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可见，这一学术理论若论其源头，无疑是始于苏秉琦对斗鸡台考古发掘所得陶器材料的精彩演绎。

如果说中国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的地层学的成熟运用是以梁思永在殷墟后岗遗址清理出来的“后岗三叠层”作为标志，那么，另一大方法的类型学的成熟正是从斗鸡台考古发掘的实践中学育出来的。此外，斗鸡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也继承了中国考古学第一代学人和第二代学人的学术传统。

总而言之，斗鸡台遗址田野考古发掘作为民国时期完全由本国学者组织、开展、整理和研究的一项重要田野考古活动，与同时期的殷墟发掘遥相呼应，是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中国考古学早期发展产生了多维度的学术意义，并持续且深刻影响着中国考古学的后续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23BKQ015）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探寻石家庄城市之源：东垣古城的千年历史与考古新发现

陈凯 赵嘉怡

古工作历史脉络、全面勘探收获、重点发掘成果三方面，详解东垣古城考古工作的整体情况与核心发现，清晰还原古城的历史面貌、空间布局及功能体系。

东垣古城于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首次发现。此后，河北省及石家庄市文物主管部门持续对东垣古城周边开展墓葬与遗址的调查工作，区域已发现的墓葬、遗址遗存以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主，代表性遗存包括高汉汉墓聚落区、张耳家族墓群等。

2023年起，为配合石家庄城市发展与东垣古城遗址公园建设，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古城开展全面勘探，覆盖面积逾3000亩，共发现遗迹403处，含宫殿基址区、夯土墙垣、城壕、道路、水系等十余类遗存。通过全面考古调查和勘探，结合历年考古工作及文献资料，确认其为太行山东麓冀中南部地区战国秦汉尤其是两汉时期最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该城始建于战国，经多期修筑改建，主体为两汉遗存，魏晋后衰落。本次勘探初步探明了东垣古城的城市基本形态和空间布局，为考古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该城或为两汉都城外唯一存有12座城门且呈“旁三门”格局的郡国城址；“三纵三横”路网及重要水系构成城市主体框架并划分功能区；城内中北部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大概率是两汉魏晋时期恒山国、真定国的宫署区；城内中部偏南及东南部有密集的两汉手工业作坊遗存，东南部为居住密集区。

2022年起，东垣古城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第一次发掘面积共计1680平方米，发现灰坑、道路、水井、沟、墓葬、灶、冶炼炉等各类遗迹200余处，出土陶、铜、铁、石、骨等各类材质的可复原文物258件。

组建“多学科协作团”与“兴趣小组”，实现专家资源田野化。在项目筹备阶段，即根据遗址性质与教学目标，组建由项目负责人、科技考古专家（环境、动植物、年代学等）、技术人员及信息技术人员构成的核心协作团。同时，指导学生按兴趣成立多学科研究兴趣小组，提前进行文献研讨与问题准备。

协作团专家需全程或分阶段深入工地，其职责兼顾研究与教学：在现场进行示范、指导学生识别现象与采样、即时解答疑问、参与工地研讨会并动态调整计划。对无法常驻的专家，建立定期巡查与线上答疑平台，确保技术支持及时可达。

装备“移动实验平台”，实现分析能力现场化。推动基础便携设备成为实习基地标配，主要包括：高倍便携显微镜，用于观察微痕与残留物；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pXRF），用于元素成分快速分析；便携式近红外与拉曼光谱仪，用于有机物与无机物检测；全站仪、RTK、无人机及便携三维扫描仪等，强化空间信息采集。

同时，在工地驻地建设具备基本条件（电力、工作台、冷藏等）的现场实验室，用于样品初步处理与临时存放。

优化采样与记录流程，实现信息获取协同化。发掘前，由协作团共同制定多学科信息采集标准与采样方案，并对实习生进行集中培训。发掘中，利用便携设备获取的初步数据实时参与现场研判，指导发掘决策与采样策略调整。记录环节，借助移动终端与云端数据库，将文字、绘图、分析数据、影像、三维模型及采样位置等信息进行时空关联绑定，构建一体化数字档案。

构建开放协作网络，实现资源整合社会化。推动“校一所一企”联动，与本校相关院系、省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博物馆及文保企业等建立合作，鼓励校外专家携带设备参与实习支持，探索设备租赁与服务购买等灵活方式。在规范前提下，邀请农史、环境史等相关领域学者或资深爱好者参与特定环节，拓宽学生视野。

价值与展望：重塑田野考古教学的意义

山东大学焦家遗址考古团队实施的田野考古“实验室前置”教学模式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关于该模式的教学评价机制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从目前的效果反馈来看，该模式将对高校田野考古实践教学带来革命性提升。

有效提升信息保真度与时效性。最大限度减少遗存从出土到分析的时空延迟和中间环节干扰，保障关键信息的原始性和有效性，显著提高考古记录的科学价值。

强化发掘过程的科学决策。现场即时获取的科技数据为遗迹现象解读和后续工作安排提供了实时科学依据，避免盲目发掘导致的信息损失，提高发掘质量。

深度融合多学科视野于实践源头。学生在发掘“第一现场”即接触、学习并实践多学科交叉的思维方法与技术手段，培养其整合多种信息源解决问题的能力，塑造复合型知识结构。

激发学生探究式学习与创新能力。现场即时分析的结果能迅速反馈，形成“观察—提问—检测—解答—再提问”的探究闭环，极大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主动研究意识。

高效支撑社会生活史研究目标。为全方位复原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技术、环境、信仰等提供高质量、多维度的第一手数据链。

推动考古资源开放共享与协作创新。开放协作网络的构建，优化了考古和技术装备资源配置，促进了知识流动，为考古学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结语

考古学研究向深层次社会生活史转向并与多学科方法深度融合，对田野考古提出了精细化、科学化的新要求。高校田野实践教学必须与时俱进。传统的“实验室后置”模式已难以满足考古遗存价值最大化提取的需求。“实验室前置”并非简单搬运设备，而是构建多学科深度参与、便携设备即时分析、现场动态决策与教学融合的新模式，代表田野考古思维的革新——将实验室的严谨性、分析的即时性与田野的探索性有机结合。

推行这一改革，需要高校在观念、经费、师资、设备与合作机制等方面系统推进，核心是培养兼具扎实田野技能、现代科技视野与多学科整合能力的新时代考古人才，使其能运用科技之眼，在田野中更清晰地解读古代社会，为探索文明发展贡献智慧。这不仅教学方法改进，更是回应时代、引领学科发展的关键一步。田野考古教学的未来，在于让实验室的思维与技术真正扎根发掘现场。

【注：本研究为山东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田野考古实践教学中的“实验室前置”研究（2023Y196）、面向“考古+”拔尖人才培养基地的《考古地质学》课程建设（2024Y180）及考古绘图课程“三维融合”教学体系研究（2024Y179）的阶段性成果。】

『实验室前置』赋能社会生活史研究与多学科协同实践：田野考古教学的范式革新

陆青玉 王芬 武昊 姚帅 陈琼 申静怡 岑卫

2026年4月25日

当前我国考古学已转向多学科合作视角下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但田野考古教学仍存在科技融合不足、现场分析薄弱等问题。本文提出“实验室前置”教学改革，通过发掘初期引入多学科团队与便携设备，实现信息全流程科学采集，以支撑社会生活史复原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学科转型背景下的田野考古教学挑战

当前，中国考古学正经历深刻的范式变革。研究目标已从构建文化序列，转向多维探求古代社会结构、经济、技术、环境与精神信仰，致力于“理解过去人们如何生活”。这一转向提升了考古遗存的价值认知——器物、遗迹乃至土壤，皆成为解读古人行为与社会互动的关键载体。同时，科技考古推动的多学科融合已成主流。环境、动物、植物考古及同位素分析等技术，极大拓展了信息获取维度与解读精度。多学科合作正在从传统的“物理的叠加”迈向了“化学的融合”，要求田野工作自发掘之初就要具备交叉学科的视野与技术准备。

在此背景下，田野考古实践教学的传统模式面临严峻挑战。高校实习长期侧重于地层学、类型学等基础训练，现场信息提取多限于宏观观察与基本测绘，大量样品检测与分析后置至实验室。这种“田野采集—实验室分析”的割裂模式，难以适应当前对社会生活史信息与多学科整合的需求，易导致信息时效丧失、原始状态改变、现场决策缺乏支撑以及多学科链条断裂等问题。教学实践亟待范式革新，以回应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

时代需求：社会生活史转向与多学科融合对田野考古的新要求

学科重心的转移对田野考古的信息获取提出了如下系统化、精细化与即时化的新要求。

信息维度的多向拓展。需超越器物本体，关注附着于其上的使用痕迹、工艺与流通信息，这些脆弱信息易在发掘清理中丢失。

需获取高分辨率的环境背景信息，如古土壤微形态、孢粉、植硅体等，它们具有强烈空间属性，必须在现场精准定位与采样。

需精细记录分析与遗迹功能相关的空间结构及微环境信息，如特定区域的土壤化学特征、微遗物分布等，以解读人类行为。

信息提取的科学化与及时性。遗存信息的提取存在“黄金时间窗口”。如有机残留物、DNA等不稳定信息一旦暴露于环境变化可能迅速降解，必须依靠现场即时采样与保护。

发掘过程需要技术手段的动态指导。现场科技分析能即时解答遗迹边界、堆积性质等疑问，从而调整发掘策略，避免因操作不当导致信息永久丢失。

需推动多学科信息现场整合。多学科专家亲临田野现场，参与决策并指导采样，能确保样品的代表性与关联性，实现不同学科信息在现场尺度的交叉解读。

现实困境：高校田野考古教学中科技应用的滞后与短板

多学科合作考古虽已成共识，但据笔者调查，不少高校田野实践教学中的科技融入仍显不足，田野教学环节存在诸多短板。

“实验室后置”模式根深蒂固。当前教学仍以调查、发掘、记录等传统技能为主，遗物样本多运回实验室后才进行分析，或者采取“本校学生采样，校外平台检测”模式。这种“割裂”流程易导致信息链断裂：从出土到实验室，经历包装、运输等环节，遗存的原始埋藏信息，如器物姿态、土壤即时状态等可能丢失或改变，削弱了实验室结果与田野背景的关联。

现场即时分析能力严重匮乏。受限于人员与资金，许多高校实习基地缺乏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学生无法在现场对遗存进行初步观察与判断，难以及时做出保护与清理的科学决策。对于易降解样品，缺少现场采样、固定与保存条件，进一步增加了信息流失的风险。

多学科专家参与度低且滞后。不少高校团队仍延续专家“事后介入”的模式。动物、植物、环境考古等专家常在发掘结束后才参与，错过了现场指导采样、解答疑问的关键时机。学生因而在考古第一现场向多学科专家学习的机会，不利于形成跨学科视野。

教学资源与平台支撑不足。部分高校考古教学经费有限，难以为实习基地普遍配备便携式分析设备与专业团队。同时，缺乏有效整合校内外多学科专家资源，使其常态化参与田野教学的协作机制，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升。

破局之道：构建“实验室前置”的田野考古教学新范式

为应对上述困境，山东大学焦家遗址考古团队结合多年实习经验，提出并推行“实验室前置”教学改革。其核心是将实验室的分析思维、技术能力与专家资源向田野发掘的起点和全过程迁移、渗透，实现实验室功能的现场延伸与即时化应用。具体路径如下：